

文物鉴赏丛书

WEN WU JIAN SHANG CONG SHU

文房用具

WEN FANG YONG JU

华慈祥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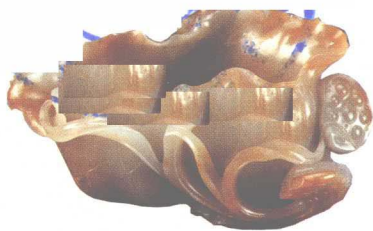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文物鉴赏丛书

文房用具

华慈祥◎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房用具/华慈祥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9

(赏玩丛书)

ISBN 7-80678-310-5

I. 文... II. 华... III. 文房用品-鉴赏-中国
IV. K8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1143 号

· 文物鉴赏丛书 ·

文 房 用 具

作 者 华慈祥

责任编辑 童辰翊 冯 磊

整体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4

印 数 0001—4000

出版日期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8-310-5/K·59

定 价 30.00 元

一、文房用具的兴起

笔、墨、纸、砚是中国人的传统书写用具，合称为“文房四宝”。但在文人书斋中，为配合笔、墨、纸、砚之用，还有诸多的辅助用具，如水注、水盂、笔洗、笔架、笔筒、笔船、墨床、臂搁、调色器、文具盒等。这些各具功能的文房用具与“文房四宝”共同为文人的砚田笔耕提供了必备之需，同时也为书斋营造出高洁雅逸的情趣。各种文房用具是在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据史籍记载或出土文物证明，我国商周时期已有玉调色器；两汉已有水盂、砚滴、笔格等出现；唐宋时期，书画艺术逐渐兴盛，文房用具品类增多，制作也愈发完善，反映了文人雅士对器物形态美的追求；明清时期，文房中的所备之物已一应俱全，除实用性外，日益讲究装饰性和艺术性，形制取意自然或效法古物，文房用具已成为文人雅士书斋案头的清玩之物。

1. 文房用具的萌动期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房用具尚处于萌动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时期至秦代，文房用具处于萌发状态；第二阶段为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用具已有零星出现。

在第一阶段，非专门的文房用具，或者说文房用具的雏形，已经产生。

文房用具是随着书写的出现而慢慢诞生的。新石器时代至秦，由于此时的陶器、甲骨和简帛上留有用笔描绘的纹样和书写文字的迹象，故笔的存在是确定的。笔在用后一定要经水洗，方能重复使用；而在研磨矿物颜料和书写用石墨时需要加水，故浣笔用具和注水用具作为笔使用时的必备器皿，也一定会有。但此类用具与后世文房中的专门用具还有区别。浣笔、注水的功能是与某种水器兼有的，如陶盂，新石器时代至秦



1、商 玉调色盘

代的就有较多出土。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有新石器时代的泥质灰陶盂出现；甘肃崇信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秦墓中也有一件陶盂；敞口，假圈足，内底有阴文“卤市”戳记。此类陶盂的用途是贮水，故研磨时用来注水，浣笔时充作笔洗也是可以的。

除了陶盂这类文房用具的雏形外，商周时期，由于调和朱砂等矿物颜料的需要，出现了玉质调色器，这些调色器制作精细，可能具有某种礼器的意味，当然，也可

以看作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文房用具。如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有玉调色盘。玉调色盘呈方形，似铲状，盘底残留朱砂痕迹，盘后端雕琢一双对称的鸚鵡。鸚鵡背向站立，昂首尖喙，短翅长尾，鸚鵡正面纹饰为双线阴钩。此器从鸚鵡的造型和纹饰来看，是典型的商代玉雕风格（图1）。

河南洛阳庞家沟出土有西周早期卧牛形玉调色器。牛首前伸，四肢屈伏，牛身作方形，背部宽平，上有四个圆孔，可供调色

之用。此器从纹饰看，具有商代特征，但向上弯曲挑起的臣字眼角，已是西周风格，说明是一件由商向西周玉雕风格转变的玉器（图2）。

除了彩绘纹样专用的调色器和兼用的陶盂外，这一时期的文房用具并无别例。

在第二阶段，即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用具已有零星出现。

从历史文献来看，已有若干史籍记录有文房用具。如西晋葛

洪《西京杂记》云：“晋灵公冢……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广川）王取以为书滴。”广川王盗墓得到了玉蟾蜍，改制为书滴，即砚滴。南朝梁吴均的《笔格赋》云：“幽山之桂树……翦其匡条，为此笔格……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座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此赋道出了笔格的材质（桂树枝条）、形状（若九疑之争出——山峰形）和功能（储笔）。另外，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集序》也提到了笔床。

这一阶段，文房用具的实物，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都有零星出现，

如水盂、水注等注水用具。材质有陶、瓷、玉、铜等（详见后文）。

另外，两汉魏晋时，有一类辟邪形的圆雕动物，见有铜、玉质，一般作昂首挺胸、张口露齿状，身上饰有飞翼。后人将其归为镇纸一类。但此物应该是镇席而非镇纸用。据西晋葛洪《西京杂记》云：昭阳殿的白象牙簾上“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这四件玉镇是用来镇昭阳殿上的白象牙席的。镇纸在汉魏时不大可能出现，因为当时纸张尚未大量进入书写领域，公私文书多用简牍，不可能有镇纸产生。



2、西周早期 卧牛形玉调色器

2. 文房用具的渐盛期

——隋唐宋元时期

隋唐宋元时期文房用具进入了逐渐兴盛的发展阶段。

这是因为文房用具的总量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较为全面地登上历史舞台。而文房用具的大量出现同文人阶层的产生有关。文人阶层的兴起源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而盛于唐，是由朝廷统一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制度，用于选拔官员。但科举考试每年全国只录取极少的人，使得大批文人闲置。文人与官僚合而为一的现象开始分解，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人阶层。退隐田园或闲居都市的文人墨客无望于仕途，遂开始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图3）。其中，遣兴于笔墨文章是多数文人的一生寄托。如此，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

房用具带着文人的情怀大量出现。而隋唐宋元时期书画艺术的兴盛，也大大促进了辅助书写、绘画的文房用具的发展（图4）。

有关的历史文献对此期的文房用具也有较多记载。《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详细记录了各类文房用品，分成11节加以描述，其中有专文描写砚匣、研屏、笔格、水滴等。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也记有砚滴、灵壁砚山、古玉笔格。宋林洪《文房图赞》和元罗先登、樊士宽的《续文房图赞》中，也罗列了各种文房用品，并且按照唐韩愈在《毛颖传》中给文房四宝赐姓名和官衔的旧列，也赐姓名和官衔于文房用具。如水中丞是水盂的官衔，姓水，名潜，字仲含，号玉蜍老翁；笔山称石架阁，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镇尺叫



3、传宋 十八学士图局部

边都护，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书记指印章，名篆，字手章，号明信公子……等等。以姓名字号点出文房用具的外形和个性，有官衔表明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充分说明宋人对文房用具的熟知程度。唐宋诗词中出现了很多对文房用具赞美的句子，如唐皎然《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诗：“砚滴穿池小，书衣种楮多”；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

书签映隙曛”。宋陆游《不睡》诗提到了蟾蜍形砚滴，诗云：“水冷砚蟾初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

从出土的文房实物来看，也可说明唐宋元时期文房用具的状况。出土的文房实物各地有显著增加，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出土有青玉笔格、水晶笔格（图5）、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考古报告称“杯”，但从敞口的形状与同其他文具共出的



4、传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情况看，应是笔洗）。这些出土的玉文具呈现出某种组合，反映了此一时期文房用具兴盛的态势。

这一时期出土和传世的文房实物较之汉晋均有显著增加。除了前期已有的注水用具外，新增了浣笔用具、置笔用具和镇纸用具等，如笔洗、笔床、镇纸。文房用具的材质也更为多样，陶、瓷、石、铜、玉、玛瑙、水晶等皆见于文房用具的名目（详见后文）。

3. 文房用具的繁荣期

——明清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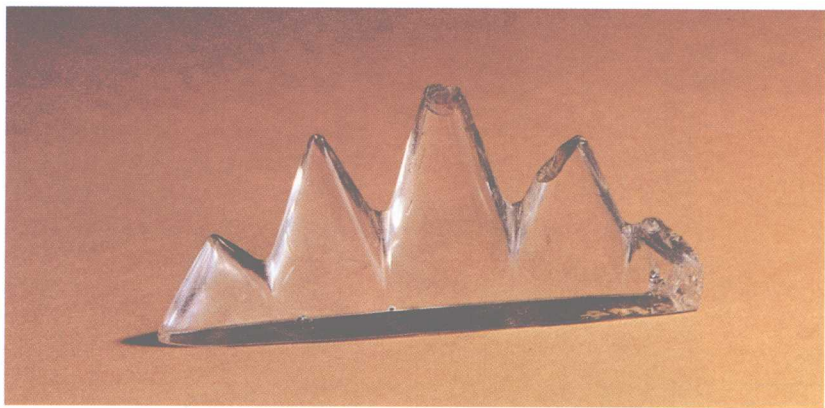
经历了先秦至汉晋的萌动期，隋唐宋元的渐盛期，文房用具的发展在明清时（特别是明中期至清中期）进入了繁荣期。水盂、砚滴、笔洗、笔筒、笔格、墨床、镇纸、臂搁、印盒等文房用具在文房书案上各占一角，各司其职，营造出雅致怡情的文房意趣，文房用具在品类、材质、形制等方面的成就，令前代无可比拟，而后世也难能企及。

文房用具的繁荣昌盛是与明清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明清时期，城市经济高度发达，市民、文士阶层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文房用具需求也日益增强。同时，随着封建人身束缚关系的普遍减弱，手工工匠的身份与

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这极大地提高了工匠的艺术创造能力。

而此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闲、静、幽、雅、逸”，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文房用具固有的典雅高洁之气质，为文人所雅好，自在情理之中。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又对社会趋向、喜好起到引导的作用。文士群体对文房用具的雅好同样也会指引社会风尚。同时，皇室亦青睐之，如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有不少文房用具，如碧玉笔格。水晶兽水盂、水晶鹿镇纸、玉荷叶形笔洗等。喜文嗜古的乾隆皇帝对文房用具也是情有独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瓷质小文玩、掐丝珐琅



5、南宋 水晶笔格



6、清乾隆 雕漆文房用具一套

龙纹文房用具、雕漆文房用具(图6)和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成套制作的。由于帝王与文士的喜好,文房用具遂大昌其盛。

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是“文房四宝”在明代得到了大发展。以砚、墨为例,宋元时期的砚还是以实用为主,到了明代,砚发生了许多变化,逐渐成为一种艺术与实用兼有的工艺美术品。而制墨业在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墨进入了商品生产行列。当时的制墨中心徽州,墨肆林立,名家辈出,形成制墨业上的歙派和休宁派。“文房四宝”在明代完成了由

实用向艺术欣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的转变,这对文房用具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明清的许多文献对文房用具也有大量记载。讲述比较集中的有:明屠隆的《文房器具笺》,它提到的器具有笔格、笔船、笔洗、水注、印色池(印盒)、镇纸等数十种;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卷七之“器具篇”,也言及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砚、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秘阁(臂搁)、镇纸、压尺、印色池等。还有明高濂的《遵生八笺》,其中的“燕闲清赏笺”载有《文房器

具篇》，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镇纸、璧尺、图书匣、臂搁、笔觚、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根据文献，明代琢玉名家陆子冈也制作过不少玉质文具，所制水中丞“碾兽面锦地，与古尊壘同，亦佳器也”；又有“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也是水盂），上嵌青绿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爱”；“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印盒），工致侔古，近多效制”。在清乾隆的御制诗中也有大量赞誉文房用具的诗篇。如《咏乌玉笔筒》、《咏和田玉荷叶洗》等。

明清文房用具的实物更是丰富多彩，无论在品类、材质和制

作上都远胜于前代。笔筒、笔掭、镇尺、印盒、臂搁、砚屏相继问世（某些品类在前代文献中已有记载，惜未见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文房用具的品类，也使各项辅助功能更为完备（图7）。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玛瑙、水晶、金银、珐琅、石、铜、铁、玉、漆等各种材质都被用来制作各款文房珍品，材质的个性在书斋中得到张扬：竹木的清新高节、金银的雍容富贵、珐琅的华丽多彩、玉的典雅温润和铜的古朴沉着，或者互相映衬，或者以单一质地独自发扬。而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见于造型、色彩、纹饰诸方面，均超过前人。



7、清 姚文瀚摹宋人文会图局部

二 文房用具的分类

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的各种文房用具，按其材质可分为瓷文具、铜文具、玉文具、竹木文具、珐琅文具等。按其功能可分为置笔用具、浣笔用具、匀笔用具、置墨用具、镇纸用具、注水用具和其他用具等。本节主要从使用的角度出发，对不同用处的文房用具加以分类论述。

1. 置笔用具

置笔用具是指放置毛笔的器具，有笔格、笔筒、笔插、笔簪、笔船、笔床等。其中的笔筒、笔插是用于将笔竖向置放的，而笔格、笔船、笔床、笔簪等则是用于使其斜放或横放的。最常见的置笔和用具为笔格和笔筒。

笔格

笔格，又称笔架、笔搁、笔山，是一种斜卧式的置笔用具。笔格的形状各异，但都有数个搁笔的凹口，避免了笔与笔之间的相互粘碰，又由于是横向置笔，笔毫上所蘸的墨汁不会顺流至笔管，故

为书写或作画间隙时放置湿笔的文房用具，也是文人书案上实用与美观兼而有之的佳器。

前文已经说到，古代文献中，“笔格”最早出现于南朝梁吴均的《笔格赋》，赋中描写的笔格，其材质为桂树之枝条。在文人雅士退隐山林，谈禅论道的南朝，出现取自然之物而为笔格是很自然的。

唐宋时期，笔格（笔架）已成文房的常设之物，唐宋文人的诗文中也常有提及，如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之“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唐陆龟蒙《和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唐罗隐《暇日有寄姑苏曹使君》之“珊瑚笔架真珠履，曾和陈王几首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之“远峰列如笔架”等等。

其时，笔格的材质已多样，除了唐罗隐诗提到的珊瑚笔架，《开元天宝遗事》言及“学士苏颋，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宋稗类抄》卷之八有“铜绿笔格”；宋周

密《云烟过眼录》有“古玉笔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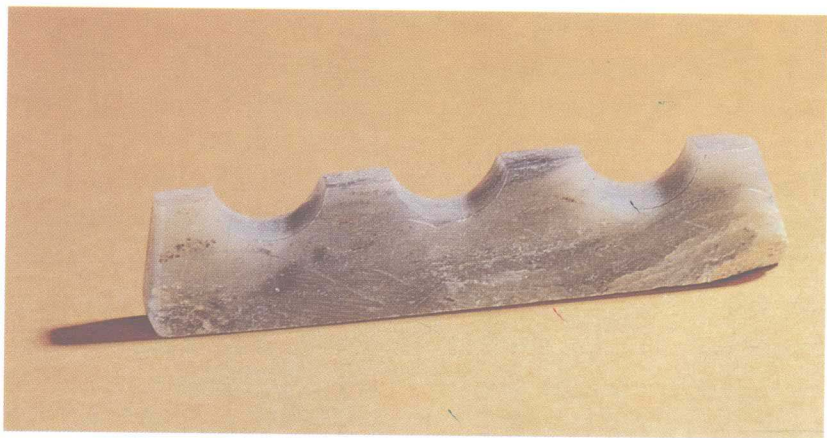
明代晚期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文房器具笺》、文震亨的《长物志》都有关于“笔格”的条目，并将其放在各条目之前。那时，笔格的材质更为广泛，《遵生八笺》笔格专条云：“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见哥窑五山三山者，……有铜螭起伏为格者。”如此，按高濂所说，玉、珊瑚、水晶、犀角、瓷器，甚至天然树根都可成为制作笔格的材料。

清代，乾隆皇帝曾为一件鹿角笔格赋诗一首：“茸长八叉老，蛻然去不留。……雅宜供架笔，毛颖本同游。”

历代流传和考古发掘的笔格实物也有不少。由于时代确切的

发掘品较多，我们可以对笔格进行如下研究。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不同质地的笔格。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出土笔格，是江苏无锡兴竹宋墓所出的影青瓷兽形笔格水注，此器在“两兽间挑出鹿角形笔架”，是一件笔格与水注两用型器物。发掘者根据同出的漆器推断，此墓的时代为北宋中期。除此以外，宋墓中出土的笔格还有：河南方城盐店村北宋宣和年间墓的两件石笔格、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宋初年窖藏端石笔格、浙江诸暨南宋庆元年间董康嗣夫妇墓的石雕笔格、江苏江浦黄悦岭南宋庆元年间张同之夫妇墓的铜笔格、江西临川县庆元年间的铜笔格、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的青玉笔格(图8)



8、南宋 青玉笔格



9、明 正德青花灵芝阿拉伯文笔格

和水晶笔格、浙江杭州北大桥南宋墓的漆笔格、浙江兰溪南宋墓的铜笔格等。从中看出，宋代笔格的材质已有瓷、石、铜、玉、水晶、漆等多种，此也可印证文献记载笔格材质有石、玉、铜、珊瑚等所言不虚。

分析这些出土的笔格，除了影青瓷兽形笔格水注器形特殊外，宋代笔格可分为三式：一式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三、四个圆凹孔用来搁笔，如史绳祖墓的青玉笔格；二式亦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二、三个圆凹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形凹孔从其尺寸（4厘米左右）来看应该是搁墨

的，如张同之夫妇墓的铜笔格；三式为山峰形，山峰或为陡峭，或呈平缓，峰峦少至五个，如史绳祖墓的水晶笔格；多达二十个的，如董康嗣夫妇墓的石雕笔格。

考古发掘所出的元代笔格有：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的铜鱼形笔格、浙江杭州元代窖藏的青花笔格水注、北京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的黑石笔格和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影青瓷笔格等。从中可知：宋代的一式、二式笔格已经不见（或许是较为简陋之故）。山峰形笔格成为元代笔格的主流，只是山峰数量大大减少，一般是四、五峰。以后，明清的山峰形笔



10、明 白玉透雕梅花笔格

格承续元代的风格，峰数一般不超过五个。

明代，特别是明代晚期，笔格更成为文人书斋中最为主要的文房用具。明清两代的笔格出土较为少见，见之于报告的只有明早期山东朱檀墓的碧玉笔格、明晚期上海潘允徵墓的锡笔格及北京清早期墓的水晶笔格。朱檀墓的碧玉笔格不见图像，其余两件都作山峰形。相比之下，传世的明清笔格较为多见，从材质上看，新增了珉琅、象牙笔格，瓷质笔格有较多出现。从形状上说，可分为三式：一式承前期的山峰形，但峰数为“三或五”，峰体也较为粗壮，喜好用描绘、雕镂、附加纹饰对山峰进行装饰（图9）；二式为象生类，即以自然生物本身的扭曲、起伏

而形成的凹陷来作搁笔之用，其源头可上溯宋影青瓷兽形笔格水注和元铜鱼形笔格。又可细分象生动物，如故宫博物院的清青玉三鹅笔格；象生植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白玉透雕梅花笔格（图10）；象生人物，如故宫博物院的清白玉婴戏笔格；象生景物，如故宫博物院的清白玉桥形笔格。屠隆的《文房器具笈》“笔格”条对此类象生笔格也有记载：象生动物“有旧玉子母猫，长六七寸，白玉作母，横卧为座，身负六子起伏为格”；象生人物“有白定卧花娃，莹白精巧”。三式为天然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鹿角笔格（图11）。此类天然笔格最为文人称道，高濂的《遵生八笺》云：“余见友人有一老树根，蟠曲万状，长